

## 评《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刘军

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1994—1997)、现任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波兰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比·W·科勒德克出版了《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一书(2000年6月,上海远东出版社翻译出版),生动地描绘并反思了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波兰的经济转轨历程。其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身份使本书的史料和分析显得极有说服力,读来十分可信。

在波兰,科勒德克被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本书正是作1998年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门做高级访问学者时完成的。作者从政治、经济的交叉角度出发,以国内的政治变迁和国际经济的全球化为大背景,对1989年以来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历程作了系统的总结与回顾,用十分个性化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背景、进程及走向,用大量详实的统计数据 and 列表来论证休克疗法带来的恶果及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未来的经济转轨道路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

可以说,科勒德克是中东欧转型国家到目前为止对经济转轨反思最为深刻、最为彻底的学者之一。他犀利的笔锋直指经济转轨中种种错误的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灾难性后果,将大量的篇幅集中于对过去10年经济转轨的讨论,着重分析了过去经济转轨大衰退的原因,揭示了在经济转轨10年后的一些变化,同时也设计了未来的经济转轨道路。

(一)非经济因素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作者对过去经济转轨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在经济转轨中是非经济的因素而不是经济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人们必须对经济转轨的非经济方面给予足够的注意,否则难以正确理解经济转轨并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转轨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而且“政治事务确实比经济因素更能影响历史的走向”。因此,作者得出结论:“90年代初的激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和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经济和财政的因素起决定作用。”

综合来看,这些非经济因素包括:(1)整个转轨地区从官方到民间的“幻想与错觉”。主要是人们对于正在进行的经济转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经济转轨后马上就能摆脱危机,很快就会与发达国家看齐,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充斥着一种虚幻的假象。(2)“越糟越好”及“创造性毁灭”的观念。经济转轨之初流行一个似乎正确的三段式:现状越难以忍受,人们要求变革的愿望就越强烈;人们要求变革的愿望越强烈,改革与转轨的结果就越好。(3)对待“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盲目迷信。

巴尔采罗维奇1992年指出,波兰在转轨初期曾数次试图掩饰产出下降的真实规

模和实际生活水平恶化的程度，如 1990 到 1991 年的 GDP 共下降 17.8%，被调整为流行的 7%，当年的财政部长休克疗法坚定的推行者看来也在反思。在“越糟越好”及“创造性毁灭”观念的影响下，后社会主义的遗产被完全否定，计划是消失了，但市场却不会马上出现。旧的制度迅即被剔除，新的制度却难以在瞬间建立。对“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盲目迷信，使经济转轨失却本土特色。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不同于拉美，正如相同的药方不适用于不同的病情一样，拉美的“药方”在中东欧前苏联造成了巨大灾难。难怪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华盛顿共识”是在 80 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只看到经济转轨及大衰退中纯经济因素的作用，大部分经济学家也只是从经济的角度去探讨转轨的得失，即使是从非经济方面去分析，也不可能将之提升到超越经济因素之上的决定性地位。作者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从非经济的方面去探讨大衰退的原因，这在分析的角度上就显得更全面，也更符合经济转轨国家的现实。政治与经济从来都不是相互分离的，更何况在转型国家，政治制度的更替与经济制度的转轨同步进行，一方的波动不能不引起另一方的反应。正如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还处在很粗浅的阶段，发展这种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对整个经济转轨的反思与其说是萧条经济学的复归，还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复归。

(二)从休克疗法到渐进疗法的转变。作者认为，与 90 年代初的转轨相比，90 年代末的转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0 年代初激进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造成了灾难性后果，90 年代末以波兰为代表的一些转轨国家实行了渐进的综合而坚定的改革，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并接近转轨前的水平。波兰实施著名的“波兰战略”计划后，经济自由化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已经转为渐进主义并取得成功，通货膨胀水平在 1994—1997 年间下降了 2/3，同时，GDP 上升了 28%。作者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在此意义上，作者提出“渐进疗法”的概念。

“渐进疗法”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能在激进与渐进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二是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来看，经济转轨是一种渐进转轨。一方面，激进的方法与渐进的方法在转轨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另一方面，转轨是一个体制推陈出新的过程，是一种发展战略工具，转轨的核心是制度建设，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来看，转轨是一种渐进转轨。作者并不否认激进的方法在转轨中的作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些环节需要通过激进的方法来推进，有些环节需要通过渐进的措施来推进。如作者认为，对于休克疗法中的稳定化和自由化可以以激进方式达到，而结构改革、制度安排以及现存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则必须是渐进性的。尤其是对制度建设，作者认为不仅要建立制度设置，还要了解制度设置。经济转轨的实质就在于制度建设，必须渐进地进行。和道格拉斯·诺斯相比，作者更加重视制度建设的渐进性。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设置是由正式的法规、非正式的约定及不同的执行方式构成的，正式的法规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改变，改变非正式的约定则相当缓慢。

科勒德克则认为，即使是正式的法规也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否则就会陷入“制度缺位”的境地。作者举例说明体制真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他说，乌克兰的生产持续下降 8 年，而在这 8 年当中，他们甚至连一部合适的民法都没有及时制定。

从各国经济转轨的实践来看，被称为激进模式的国家中有渐进的措施，被称为渐进模式的国家中有激进的身影。前者如波兰的渐进式私有化，后者如匈牙利的“激进补课”。但相比之下，作者还是对渐进的方式肯定得多一些，他说：“以革命的方式推动变革最多只能为将来创造初始条件，而渐进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取而代之。”总之，在激进的方法为转轨创造了起始条件后，剩下的路就该由渐进的方法来走了。

从休克疗法到渐进疗法的转变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核心思想。作者所称的渐进疗法包含有丰富的内容，主要有政策设计、制度建设、产权革命、财政金融改革、社会保障、分配机制改革、政府职能定位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等。作者关于私有化的观点集中体现了渐进疗法的思想。作者认为，私有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比稳定花更多的时间。经济转轨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经济转轨的过程也就是私有化的过程，那么，私有化的过程也应该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萨克斯等坚持认为私有化要快速推进，推进得更快、更深，则效果更好。但作者明确指出，波兰渐进的私有化效果明显好于激进私有化的捷克。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就坚定地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划清了界限。

(三)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作者对未来的经济转轨作出了乐观的预测：“所有转轨经济地区未来 4 到 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加权平均增长率将处于 4%到 6%之间”，而且“转轨本身能创造新型的市场经济”。但是，作者认为，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

新自由主义在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深刻影响着东欧、前苏联的经济转轨。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的神奇力量。受此影响，转型国家大多采用激进的转轨模式，以在拉美大显神通的休克疗法为榜样。但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转型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相反却带来明显的衰退；没有培育出规范的市场、企业家以及对市场竞争规则的尊重，相反却带来扭曲的“经济拉丁化”，超越新自由主义是未来经济转轨必然的趋势。

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充分和竞争的不完全，市场失灵是一种常态，所以，国家干预是一种必然。经济转轨的严峻现实以及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也促使转型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者考察了经济转轨中政府与市场两者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转型可以被看作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完美合作的持续的寻求(其实永无止境)”。在经济生活中，“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并行发展，两者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定位为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转型国家在面对转轨初期的大衰退时，都加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尤其是中东欧的北三国。波兰在 90 年代中期后实施渐进而坚定的转轨；匈牙利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是国家放弃控制的观点是“严重的误解”；捷克把“有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列为其转轨的十条经验之一。北三国在转型国家中能脱颖而出，积极加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一重要的原因。

作者对比了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他得出结论，转轨国家与改革国家的政治取向是不一样的，而且，转轨与改革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的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是同一的。尽管作者强调在转轨开始阶段甚至还存在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复归之间的争论，但随着转轨的推进，整个国家改变了态度，作为经济学家的作者也无法摆脱这一时代背景的束缚。尽管他肯定中国、越南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只是一种“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它可以比转轨国家获得更高的持续增长但这种改革变化力度不大，GDP 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长期趋势”问题。在这里，作者隐含的观点是，只有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同所有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一样，作者无法回避对民主与市场、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关系的回答。作者不理解民主也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建设过程，他认为民主是可以引进的，是和市场的自然生成不一样的，而且引人民主比引入市场更容易一些。作者还不十分肯定地强调了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说：“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似乎不可能持续长远。”在这个问题上作者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典”要求他不能离开西方民主的制约；另一方面，他又观察到他认为缺乏民主的东南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又与他的理论相矛盾。于是他不得不提出民主的作用是在于提供一种“良好的感觉因素”，即“民主能为社会提供一种经济所无法提供的价值”。而在缺乏民主的国家里，这种“感觉因素”是不存在的，需要“面包政策”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经过一番解释，一个唯心的科勒德克才跳出其尴尬的处境。

综合来看，《从休克到治疗》一书充满了作者智慧的深层次的思考，尽管在不同的政治取向的影响下，书中存在一定的局限但该书仍不失为一本反思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高水平力作。